

宫乃泉同志

与医学图书馆的建设

胡田成

· 中国图书馆事业史料 ·

你可知道，在抗日根据地里，在极其困难的条件下，是谁创办了对两次革命战争作出极大贡献的医学图书馆？你可知道，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医学科学院的创办人是如何亲自抓图书馆建设工作，从而被人称为“一位重视图书馆建设的将军”？他就是宫乃泉同志。他在党的领导和支持下，在开创我军卫生事业中，立下了汗马功劳，其中创办并一贯重视医学图书馆的建设，就是他的业绩之一。

(一)

医学图书馆最早是新四军二师卫生部于一九四二年在淮南根据地创办的。这个经历两次革命战争发展起来的新四军卫生部医学图书馆的创建与发展，首先有赖于陈毅、张云逸等军首长的关怀与支持，同时也有赖于宫乃泉同志坚韧不拔、排除困难的创业精神。

一九三七年，宫乃泉同志在南昌参与组建新四军军医处（相当卫生部），一九三八年担任军医处医务主任，主持军医处日常工作。新四军为了开辟大江南北抗日根据地，陈毅同志任新四军江南总指挥，张云逸同志任新四军江北总指挥，一九三九年秋，宫乃泉同志奉命带领一批医务人员来到江北指挥部组建军医处。皖南事变后，一九四一年江北指挥部军医处改建为新四军二师卫生部，宫乃泉同志任部长。当时新四军二师卫生部仅有这么一位从医学院毕业、并从事外科专

业的医生，他担任卫生部长，又兼医师，既要开展部队卫生保健工作，培训卫生干部，直接参加并指导医疗工作，还要负责编辑出版《医务生活》杂志，甚至部队药品、器材补给都要他管，成为一名“不管部长”。怎么办？求教于老师，没有老师；求助于同事，只有他自己一人是医生。唯一求教的就是日新月异的医学知识和实践锻炼，在战争中学习“战争”。就他的个人宏愿来说，他在攻读医大时（奉天医学院），就受进步思想的影响，毕业后立志为工农服务。他寻找共产党（武汉八路军办事处），被派到新四军军部工作，如雄鹰展开了翅膀，高瞻远瞩，努力实现他的理想和宏愿。他来到新四军后，和军医处其他领导同志在一起，不仅要解决缺医少药的问题，而且要把新四军的卫生工作开创一个崭新的局面；不仅高于国民党所有军队的卫生工作，而且把战场救治技术紧紧跟上现代的科学发展的步伐。要达到这样的目的，必须吸收掌握第二次大战中新近战伤治疗经验和信息；必须不间断的阅读中外最新医学期刊和图书，才能不断向前迈进！那么医刊、图书从那儿来呢？起初，他千方百计地通过药商从沦陷区上海买些急需中外文医学杂志和书籍。要很好履行卫生部长的职责，要胜任各种疾病的诊疗工作，就必须手不释卷、坚持不懈的刻苦学习。医学是发展的，知识在不断更新，书刊也愈买愈多，书多了，无专人管是不行了。一九四二年调来刚从卫校毕业的王子洪同志负责管

理。王子洪同志根据宫乃泉同志的指教，将图书分类、分箱（铁皮箱，便于应急挑走）、登记，拿者顺手，物归原处，有条不紊。这时它已成为一个图书馆的雏形。后来医刊图书多得办公室放不下了，看书的人也愈来愈多。这时有黄农医生（即王雨田同志，河南医学院毕业）、吴之理医生、章央芬医生（均是上海医学院毕业），国际友人罗生特医生，先后到二师卫生部工作，他们都离不开外文医学参考书，卫校教师和编写材料也离不开中文参考书，由于客观的需要，并在已有书刊的基础上，二师卫生部图书馆于一九四二年夏成立了，这就是新四军乃至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悠久的具有相当规模的医学图书馆的起源。

（二）

宫乃泉同志读书的兴趣十分广泛，他除主攻医学书刊外，还认真阅读政治、经济、哲学、文学乃至科普知识，真可谓是博览群书。解放前和解放后，在图书馆里经常可见到他孜孜不倦的身影。那时的图书馆也已发展为以医学书刊为主的综合性图书馆的雏形，成为广大医务人员业务、政治以及文艺知识的营养源泉。当时给我印象最深的，医学方面：有各种战伤外文期刊、最新版本西塞内科学、台氏内科学、系统解剖学、孔氏局部解剖学、秦氏细菌学、哈氏生理学、医学史纲等，还有中华医学杂志、《时代》杂志（有不少苏德战争战伤治疗经验，介绍苏联英勇救护的事迹报导。该事迹宫乃泉同志把它汇编成册，题名为《英勇救护员》，发到前方，对前方医务人员战斗情绪鼓舞很大）等；政治、经济、哲学方面：有马、恩、列、斯著作，包括恩格斯自然辩证法和各种哲学、经济政治学著作；文艺方面：有契柯夫、托尔斯泰、高尔基、屠格涅夫、法捷耶夫、鲁迅、郭沫若、茅盾等中外文坛巨著。当时在医务人员中，借阅最多、流传最广的

文学书籍是《西行漫记》、《钢铁是怎样炼成的》、《绞刑架下的报告》以及《海上述林》和《阿Q正传》等。《海上述林》是瞿秋白同志的文艺政论性作品，瞿秋白同志遇难后，鲁迅先生在悲伤之余，为了纪念他，把他的作品编成集子，深兰色丝绒封面，非常壮观，这样的精装本据说当时只印一千册，图书馆就收藏到一册，这在当时是难能可贵的。在科普知识方面的书刊有：《科学画报》、《人和山》等。图书馆因为有这些书，不仅使二师广大医务人员提高了医疗水平、卫校教学质量和《医务生活》办刊质量等，而且对提高医务人员政治觉悟和理论水平，鼓舞医务人员英勇救护和战斗意志，提高文学修养也发挥了一定的作用。因为我是搞部队卫生保健工作的，回忆当时《哈氏卫生学》是馆内唯一卫生方面翻译成中文的参考书，它在开展部队卫生防疫工作中起着一定的作用。我对《医史》也颇有兴趣，最早（一九四二年）我就读到李涛著的《医学史纲》，由于受到这本书的影响，我才进一步读了范行准、余云岫、王吉民等医史的著作。

一九四四年，宫乃泉同志调任新四军卫生部副部长，图书馆和《医务生活》社亦随之调到军卫生部，同年，军卫生部创办新四军军医学校（即华东白求恩医学院的前身），由宫乃泉同志具体负责筹建，从此，图书馆主要任务就转向为教学服务。

这个图书馆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中贡献是很大的。主要表明有以下几点：

1、宫乃泉同志有许多医学论文和译著。如在抗日战争期间和解放期间，差不多每期《医务生活》医刊都有他一篇至二篇以战伤为主的学术论文，如头部战伤、胸部战伤、腹部战伤、四肢战伤、血管战伤、抗休克、预防破伤风等。这些论文，绝大部份是在《医务生活》上发表的，有的还印了单行本，最后汇集了一本《战伤疗法》专著，在部队里

广泛发行。通过他的译著，大量引进和吸收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战伤治疗和先进医学，不断提高部队医务人员战伤治疗和防病、治病的业务技术水平。他不仅重视医务人员的学习和培养，而且还重视部队干部卫生普及教育。在二师时，他写过颇受干部欢迎爱读的《革命工作与卫生修养》和《生理知识》两本通俗读物。他非常重视二师卫生部直属单位医务人员的培养，除敌人扫荡和星期日之外，几乎每天每晚上都要带着最新出版的原版医学专著，以直译方式和通俗的语言给我们上课。宫乃泉同志有这么多的译著，亲自参加上述那么多的医校和在职干部授课，为部队卫生工作作出那么大的贡献，没有这个图书馆，可以说是很难办到的。

2.二师卫生部办的卫生学校、卫生干部高级研究班（四二年华中医学院解散后留下部份干部学员继续深造）；新四军卫生部办的军医学校（培养军医）、干训队（包括医训班、药训班、化训班）；华东军区卫生部办的白求恩医学院（前身即军医学校）、干训队等，这些医校之所以教学质量能够得到不断提高，其因素之一，就是有了这个图书馆，它即时提供参考图书，供教师备课、编写教材和学员们自修复习。

3.从沦陷区、蒋管区来的一批批专家、教授、医师之所以能安心在根据地、解放区部队里工作，其原因之一，就是有了这个图书馆。因为这些高级知识分子事业心都很强，生活艰苦点，他们是有精神准备的，是能够克服的，最担心的怕业务技术掉队，跟不上科学发展潮流；有了业务技术上困难没有参考书可查。有了供阅读的特别是外文医刊和图书，他们就心满意足，乐于在军队里工作，充分发挥他们的才干，为革命战争作出贡献。

这个图书馆在新四军二师、新四军军部和华东军区直属队远近都是知道的，有不少干部来馆借阅医学、政治、文艺等书籍。给

我印象最深刻的是二师政治部宣传部副部长朱达章同志（已故），他在师卫生部直属所因病住院，他以惊人的速度有系统的读了医书和许多马列著作及文艺名著，他深有体会的说：养病几个月，阅览了你们图书馆图书，不仅使我自抗疾病能力和信心加强了，而且为我读书创造了良好的条件。这个图书馆需要坚持办下去，还希望扩大非医务人员的读者。

济南解放后，从一九四八年开始，华东白求恩医学院先后与山东省立医专、齐、鲁大学医学院合并，并改为山东医学院。在宫乃泉同志长期培植之下，该院图书馆目前已成为藏书二十多万册的大型图书馆了。

在一个较长时期中，李万玉同志主要分管图书馆，而我主要负责《医务生活》医刊及该社出版具体工作。两人先后又同是二师卫生部、新四军卫生部在江守默科长领导下的医保科的成员，同在一个屋子里办公，工作分工虽然不同，但又是很好合作者。我们都是宫乃泉同志的信赖和培养下成长起来的。从一九四三年起，他开始管理图书馆，一直未离开图书馆。他是一位工农出身，又是一位残废军人，由于他对这个专业的热爱和对管理业务刻苦钻研，后来成为山东医学院图书馆一位很成熟的馆长。在淮南和山东时期，宫乃泉同志所有的论文、著作，全是通过《医务生活》医刊或该社发表、出版的，也都经过我清稿、校对、出版、发行，乃至所有书的封面几乎都是我设计的。所以，我们两人都是宫乃泉同志在这些业绩中的具体经办人。不仅如此，宫乃泉同志那种创业精神，对我们两人教育极深，影响也极深，记忆也极深。

（三）

在战争烽火的动荡年代，经济困难，要办一个图书馆是极不容易的，要冒险采购图书，使图书馆不断发展充实，那更不容易。

因为采购者要通过日伪敌人层层封锁线，既使到了上海沦陷区，能否买到还有许多周折，甚至要冒生命危险。每次购书单都是宫乃泉同志亲自选定的。记得最初宫乃泉同志培养一位目不识丁的姓邹老乡。他是来往于淮南古城和扬州地区，用当地土产换点日用品，弄点脚力钱。宫乃泉同志试探性的请他到上海买药。这位姓邹的为人忠厚，办事热情，每次采购药材都能完成任务，并顺便采购一些医刊书籍。后来又得到庞牧师、陆某某等人的帮助。他们都是上海人，有他们的帮助，采购药材和医学书刊的路子就更广了。他们不仅带药带书，还在地下党的协助下，把一批批医生和护士带进解放区。解放后，陆某某在上海卫生局供职。其他还有帮助采购书刊的一些人，我就记不清了。总之，新四军卫生部医学图书馆能得到生存、发展，就不能忘记曾经对图书馆建设作出贡献的这些人。

宫乃泉同志深知每一本书刊的来之不易，图书爱犹同战士爱护武器一样。他强调图书应有专人管理，先后派了王子洪、胡维、李万玉担任了图书的管理员，并建立了借阅管理制度。记得一九四二年秋，日伪对淮南根据地大扫荡时，我也参加了护送十几担图书到旧铺打埋伏，把书箱埋进地里，但书还未埋完，鬼子就进庄了，我们深知责任重大，以最高速度，把书箱全部埋进麦地里，保全了图书未受损失。日伪对淮南根据地经常扫荡。当我们得知敌人小扫荡时，管理图书的同志就把图书装箱编号，以三箱、五箱地分散到许多老乡家里，要用图书时，管理图书的同志既担风险、又很艰苦地从几十里外走东家串西家，依着书箱的编号、图书编码一本一本去取，用完后再依次归还。据李万玉同志回忆，一九四七年国民党反动军队重点进攻山东胶东时，图书和贵重医疗仪器就运送到高乳山县耿家村二十多里的山沟，将图书箱子深夜秘密埋到麦田地里，并

将麦子再种上作为伪装，做到万无一失。

(四)

宫乃泉同志一贯重视医学图书馆的建设工作。一九五二年，他在华东卫生部担任副部长时，奉军委命令，在上海组建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医学科学院，并担任第一任院长。他深知肩负这样重任，也深刻了解人民解放军这样最高最大的医学科研机构，必须要有一个与任务相适应的健全的图书馆。为此，调来了复旦从事图书馆工作的吴尔中同志具体负责医科院的图书馆筹建工作。吴当时大胆地以上海第一医学院图书馆的规模来设计建馆，经过宫乃泉同志审定，指示要以北京协和医学院图书馆的规模来筹建。由于得到宫乃泉同志的支持和指导，仅一九五三年一年中就订购西文原版期刊、书籍近千种。一个健全图书馆，不仅要订阅现时医学期刊，及时掌握医学信息和科研成果，同时还要搜购国内外过期的书刊，力求补齐、成套、完整。据吴尔中同志回忆，那时正在搜购化学方面的过期刊物，委托北京图书馆代办，该馆来电，说在国外找到一套“利比希化学纪事”需要四亿元（当时币值一亿等于今天的一万元），他拿不定主意，便请示宫院长。



左 宫乃泉：原总后勤部卫生部副部长兼解放军医科院院长。

中 罗生特：国际友人奥国泌尿科专家，41年至49年在新四军山东军区、东北工作。

右 崔义田：前中央卫生部副部长，宫乃泉的同学

（下转第84页）

想(认识)与实践,它们共同构成一个动态的相互反馈的传变体系,在时代与历史的背景上统一了起来。不联系思想(丰富多采的,充满生活情趣的,激扬悲壮的,并且有着鲜明的历史特点的)知识是枯燥的,它是一具失却了灵魂的躯壳与僵尸。

第五,在本体论、认识论、方法论的统一中进行考察。任何知识都包含着本体论、认识论与方法论的成分,是三位一体的。知识的本体论是知识所表达的自身的概念和内容,相对于知识的认识论与方法论,它是第一性的,是本义。任何知识都具有认识的功能与方法的功能,它们是对本体论知识的引申、运用与概括,由此产生知识的认识论成分与方法论成分,并被综合、升华为知识的认识论与方法论。相对于知识的本体论,它们是第二性的,是引申义。有了知识的本体论,我们可以建立起知识发展的自然系谱(是一种神经网络式的立体结构),有了知识的认识论与方法论,我们可以建立各知识之间的认识论与方法论联系,从而实现对知识的自由运用与驾驭。

在以上的考察中,我们要运用微观和宏观、整体和部分、理论和实践相结合的方

法。在宏观考察中,不忘从微观入手,联系微观,以微知著;在微观考察中,不忘它的宏观联系与机制,在宏观上升华。当我们从整体考察的时候,不忘记它的每一个局部,要搞清楚整体如何统帅着局部;当我们从局部考察的时候,不忘记各局部联系的整体机制,并最终归之于整体。我们研究理论,那是为着实践的需要,为了指导实践,所以要从解决实际问题入手,并逐渐上升到理论的高度,从而建立起我们的理论体系,切不可置实际问题于不顾;我们解决实际问题,必须用理论来指导、来概括,才能把握本质与方向。没有理论指导的实践当然是盲目的实践,不进行理论升华的实践也是目光短浅的没有前途的实践,我们要的是理论与实践的辩证的历史的统一。

• 据观察,我国图书馆界有一段时期未开展关于“知识学”及“世界3”等问题的讨论,不是不敢谈“知识”,而是出于多种原因。从本刊编辑部来说,主要是从主客观方面估计我们当时还不具备组织讨论并谈清这些问题的条件,作者这种推断是个更大的“误解”。

——编者

(上接第94页)

当时宫乃泉同志已调至解放军总后担任卫生部副部长,宫院长满口同意订购。有一次宫部长看到图书馆有一份妇婴卫生中文期刊,受到他批评,他说,在我们军事医学院中不应该有这些书刊。由这两件事,充分表现了宫部长不仅管理内行,而且该花的钱毫不吝惜,不该花的钱决不浪费。本书。由于宫院

长的具体指示了循循善诱,医科院图书馆在军医机构中是收藏医学期刊、图书较丰富,服务态度较好、管理较善的一个图书馆。吴尔中同志深有体会的说,我们的革命老干部能这样高度重视图书馆的建设,并且能亲自参加选书,具体指导,真不愧是一位重视图书馆建设的将军。

of cognition that concern the implementation of scientific management" and "On the plan for the new building and a proposed five-year program for development". At the close of the forum, section heads made each one's own summing-up which was to be placed in their file of professional competency for further appraisal. (page 16)

"Letting a hundred schools of thought contend" policy and founding of library science theories

On occasion of the 30th anniversary of the "letting a hundred schools of thought contend" policy, the editorial board of Bulletin of China Society of Library Science sponsored a forum with "Direction of Library Research" as the chief topic, for facilitating a free, relaxed, profound and normal argument which already begun. The appearance in 1985 of Zhang Xiaolin's article "Reshaping the Direction of Library Research" in this Bulletin is like the throwing of a pebble into the seemingly placid lake of China's library field. It stimulated the enthusiasm calling for a check-up, reform, enlargement and reestablishing of the basic theory of library science. Many a scholar have contributed article to this editorial board. Quite a few of the articles, all well founded in argument, have since then been published. The initiative to organize the said forum solemnly manifested this Bulletin's stand for promoting the policy of "Let a hundred flowers bloom and a hundred schools of thought contend", in order to bring about a surge of academic discussion in library field.

The Forum was held simultaneously on May 28, 1986 with the Symposium on Theory of Library Science and Information Science sponsored by the Institute of Library and Information Sciences, Wuhan University. This Symposium will have its due place in history of library development in the following three respects, the synchronous discussion of library science and information science, young participants as the main body of a symposium, and lastly, its being run by people and subsidized by the government. (Page 88)

Comrade Gong Nei-quan and the construction of medical libraries

Gong Nei-quan (19 — 19), president to Academy of Military Medical Sciences, People's Liberation Army, and an expertised military surgeon, has always concerned himself with the establishment of army medical libraries. Even under very difficult circumstances at the anti-Japanese base area, he has established a medical library which later made great contribution to the two revolutionary wars. After the founding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again he personally took part in establishing the Library of Military Medical Sciences. He is justly accorded by people the title "a general paying full attention to library." (Page 91)